

# 关于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关系的思考

## ——基于“国家—民族”理论

吴 玥 张继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下,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本质可凝练为“国家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辩证统一。基于“国家—民族”理论框架,中华文化作为国家整体文化的主干属性,通过“主从统合”逻辑实现对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引领;前者以中华文化内核确立文明赓续的主线方向,后者以各民族文化提供创新演进的要素动力。二者共同构成“主干引领、枝叶繁茂”的中华文化发展结构,既维系了中华文化的强大主体性与突出包容性,又保证了各民族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与鲜明独特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维度的具象表达。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民族”理论;国家文化;中华文化;各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25)01—0071—08

DOI:10.15899/j.cnki.1005-5681.2025.01.011

##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Based on the "State-Nation" Theory

WU Yue ZHANG Ji-jiao

**Abstract:**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ultur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can be fundamentally distilled a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ethnic cultures".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state-nation" paradigm, Chinese culture, as 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ystem,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ethnic cultures through a "primary-subordinate integration" logic. The former establishes the enduring continuity of civilization by providing the core national ethos, while the latter contributes dynamic elements for innovation and evolution through distinctiv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a developmental framework where the "trunk" offers guidance, and the "branches and leaves" thrive, ensuring the robust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its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Ultimately, this dynamic embodies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tate-nation" theory; national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cultur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 一、引 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好“四个关系”,即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sup>[1]</sup>,这一论述涉及到文化关系问题。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认同是民族最深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着眼于文化认同,需要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内聚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sup>[2]</sup>文化建设也成为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元,并始终贯穿于理论与实践进程中。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史,各民族于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既各自形成颇具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也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

青海民族研究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我国东部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城市人口多民族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城市民族工作”(批准号:2025MZSCX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 玥,女,山东菏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人类学研究。

张继焦,男,海南海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室主任 二级研究员,中国民族学学会法人代表兼副会长,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都市与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创办人兼主任,主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那么在新时代下如何处理两者,即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解释不清楚这个命题,将可能导致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结构性错位,进而削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

近年来,关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于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族别标识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基于各民族文化共同性的族际交往研究,再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共同体视角,学界从各民族文化视角出发,在历时性维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研究由差异性到共同性的演进,关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及其关系研究的学理基础正在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sup>[9]</sup>这一论断从辩证统一的视角深刻阐释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对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明晰两者内涵与外延及发展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国家—民族”理论<sup>①</sup>为分析框架,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置于国家视角,系统探析两者作为“主干”与“枝叶”的本质特征与运行逻辑。

## 二、新时代以来学界对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历史时期,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sup>[4]</sup>对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高度概括,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sup>[9]</sup>。对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下,学界对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视角聚焦,其中多关注各民族在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共建性、交融性与整体性,不断强化“各民族共建中华”<sup>[6]</sup>的叙事逻辑。一则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整体框架来看,学者多基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讨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sup>[7]</sup>,认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主

线,如儒家文化、藏传佛教与中原文化的互动<sup>[8]</sup>;还有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为分析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关系提供理论支撑<sup>[9]</sup>。二则从文化认同入手,讨论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如指出汉字、传统节日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铸牢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sup>[9]</sup>,分析了中华文化在边疆治理中发挥凝聚功能<sup>[11]</sup>,还有学者以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文化润疆”政策为例阐明民族地区如何强化中华文化认同<sup>[12]</sup>。三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与当代实践,如北魏孝文帝改革<sup>[13]</sup>、西辽文化传播<sup>[14]</sup>等历史事件,展现出中华文化对边疆民族文化的吸纳与整合。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虽初步构建起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分析框架,但研究数量与系统性仍有欠缺,研究视角多集中边疆民族地区与多元民族文化。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明确提出“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sup>[15]</sup>这一观点。据此,学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导思想并结合文化认同<sup>[16]</sup>、中华文化认同<sup>[17]</sup>、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sup>[18]</sup>、中华民族共同体<sup>[19]</sup>等对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及其关系作出进一步探讨。从学理角度来说,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形成机理、所属范围、分层类别差异<sup>[20]</sup>,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关系<sup>[21]</sup>、中华文化主干性<sup>[22]</sup>等已成为学界共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由各民族共享。从实践角度来说,有学者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并结合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于民族地区的丰富实践进一步论述了各民族文化对“共铸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sup>[23]</sup>另一方面,学界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探讨和主体性分析逐渐进入视野,但多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鲜少见民族学视角的讨论。但无论如何,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框架下,近些年关于“中华文化—各民族文化”的研究通过引入“主干—枝叶”的生态隐喻,在方法论层面也实现了一些突破:一则将中华文化与“国家文化”相联系,不再停留于各民族文化的简单集合概念;二则揭示了文化层级的动态生成机制,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经过互鉴融通凝聚形成的不同级别的文化,这种层级关系既包含文化要素的纵向整合,也包含价值导向的规范作用;三则进一步确立了文化认同的政治逻辑,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中华文化主干要素锚定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轴心坐标,并系统融入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战略之中。

总体来看,相较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开展而日益深化的注重各民族差异性的“族别标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族际交往论”研究,以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角下从各民族文化到中华文化的研究转向<sup>[24]</sup>,新时代以来对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逐步突破了既往研究中“重差异而轻共性”“重各民族文化而轻中华文化”的认知局限,试图在理论范式上重构二者的关系框架。然而,既有研究对“主干与枝叶”这一核心隐喻的系统阐释仍显不足,未能充分回应中华文化何以成为“主干”、各民族文化如何作为“枝叶”生长的历史逻辑与实践机制;而对“多元一体”文化观的阐释多停留于“共创论”层面,即多侧重于分析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集大成”特征,多凸显出各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单向度的“输血论”叙事,而相对忽略了中华文化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例如,此前关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中,中华文化常被解构为各民族文化的机械叠加,如汉族文化+藏族文化+苗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中华文化,枚举各民族文化部件以组合成中华文化,而这实际上是将整体与部分简化为“点面关系”而无“系统思维”的局部性认知范式。此种方法论本质上仍是机械还原论的延续——预设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而相对弱化中华文化的复杂系统性。但再多的各民族文化“树叶”也组不成“主干”,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整体显现不能化约为各民族文化子集的并集运算,更无法通过各民族文化的线性叠加获得,止步于罗列文化元素的叠加与并置是难以解释为何各民族文化实践最终能够凝练为具有统摄性的中华文化认同的。因此,当前关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讨论尚未真正破题,其深层症结一是学界对“国家”维度在“国家—民族”发展中核心作用的理论自觉尚未充分形成;二是研究视角中对“国家”作为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主导力量的系统性分析存在结构性缺失;三是多聚焦于“多元一体”的表层互动机制,对讨论中华文化“主干性”的确立本质上是以国家政治共同体为依托的制度化过程有所规避。实际上,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植根于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历史实践,其以政治一统为根基、经济互通为纽带、社会互嵌为土壤、文化共享为表征,早已萌发出超越诸地域与各民族的“国家文化”内核。一方面,秦汉以降“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持续强化,通过文字

统一、礼制规范等手段,中华文化逐渐成为跨区域文化互动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因俗而治”的柔性策略,又为“枝叶”的生长预留了文化弹性空间,催生出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主干吸纳枝叶养分,枝叶依托主干延展”的动态平衡。因而,当前亟待构建以“国家—民族”关系和“国家”视角为核心的分析范式,重新阐释中华文明“源流一体”“主支合一”的发展逻辑。

### 三、“主干”与“枝叶”: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

概念界定是厘清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前提。从两者的形成机理、类别层次来说,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不同层面和不同范畴的文化,中华文化是更大范围、更为宏观、更高层次的文化,其所代表的是居于各民族之上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整体文化,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引领性,故而从数量上看它是一;各民族文化伴随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而演进,其所代表的是本民族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故而从数量上看它是多。多元民族文化融聚成一体中华文化过程中后,中华文化是贯通天地、支撑脉络的“主干”,各民族文化是主干上缀饰生机的“枝叶”,二者根植共生于中华大地沃土,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生命体,这一隐喻揭示的是两者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主从统合关系。因此,必须明确“主干”与“枝叶”的功能定位与互动边界。

#### (一)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以中国疆域为地理载体,跨越五千余年历史长河,由古今各族各地共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是经历多元文化融合与主体脉络传承的持续演进所塑造的超单一型民族复合型文明连续体。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sup>[25]</sup>从内容上来看,中华文化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一体,其核心内涵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sup>[26]</sup>。

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植根于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一统、经济一体、社会互嵌、文化共享。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孕育与演进的物质基础。黄河、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等独立地理单元及其地的民族群体既孕育出多元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又在多元文明互动中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孕育出早期中国的华夏文化和各民族群体文化一体的文化共同体的基本框架,并在其后几千年的演进中将“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推向更高层次。一则政治一统确立了中华文化延续的制度根基。秦代“书同文、车同轨”首开政治一统先河,此后大一统理念贯穿中国历史,汉代“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文化在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地位,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以“中华正统”自居并完善行省、理藩等治理体系,均彰显政治一统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熔铸。这一传统以中央集权为制度保障,以“四海一家”“华夷一家”为精神纽带,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强化国家认同。“大一统”既成为“天下归心”的统治理想,更是中华文化“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政治基因,构筑起支撑中华文化主干千年存续的政治基脉。二则以经济一体构建起共同发展的物质纽带。中华大地地理环境的多元性与经济类型的互补性,催生的是跨越地域与民族的物质交换网络。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匹、皮毛与中原农耕文明的粮食、铁器等通过“茶马互市”“绢马贸易”“丝绸之路”等联系为一体。汉唐的边市政策、贯通南北漕运的大运河、宋明的榷场体系等共同编织出官民并举、陆海联动的经济互联格局。这种“农牧互济、山海相通”的共生互通不仅突破了地理阻隔与政权更迭的局限,更以“你无我有、我有你需”的物质循环将分散的各民族经济纳入统一市场,成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一体发展的深层动力。三则以社会互嵌培育血脉相连的共同体意识。从秦汉“编户齐民”管理全国人口,到历代大规模人口迁徙推动民族混居;从北魏鲜卑与汉人士族通婚促进各民族交融,到元清大杂居、小聚居格局消解文化隔阂,再到今日的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中国社会始终通过人口迁徙流动、族际通婚方式等日益将各民族先民凝聚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结的共同体,使不同民族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中深化族际认同与共同的中华认同,最终熔铸为超越地域与血缘的中华民族命运纽带。四则以文化共享熔铸一体多元的价值体系,通过符号表征系统与意识形态整合将中华文明的多元文化要素提炼为共有的意义框架。以汉字、礼制、节庆等超族群符号为载体,大一统、儒家伦理、家国同构理念等核心价值为纽带,构建起“多元互嵌”的文化认知网络,熔铸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

## (二)作为“枝叶”的各民族文化

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

民族大家庭。千百年来,各民族在共同开发锦绣河山、推动历史进程的实践中,既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各民族文化,又以密切的经济社会互动滋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来看,各民族文化即是以中华大地多元地理单元为生存根基,在数千年文明互动中积淀生成,由特定民族基于自然环境与历史经验所创造的具有本民族与地域特征的文化。各民族文化反映的是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生产生活实践与集体智慧结晶。

正确把握作为“枝叶”的各民族文化,就不能只看到各民族文化,因为各民族文化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各民族文化本体来看,其自身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化孤岛”,而是基于中华文化在历史互动形成的“互嵌共生”的族际文化网络。历史上,各民族通过通婚、贸易、迁徙甚至战争不断接触,中原的丝绸、茶叶等传到西域,游牧民族的传统乐器、马具技术等传入农耕民族,此种交往比比皆是。语言上,汉语词汇里有源于古突厥语的“单于”“阏氏(胭脂)”,契丹语的“打粥(致敬)”,蒙古语的“胡同”,满语“萨其马”,等等;<sup>[27]</sup>维吾尔语一方面在突厥语同源词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扩大,一方面又不断从汉语、伊朗语、阿拉伯语、俄语等中吸收大量借词,其中汉语借词借入的时间最早<sup>[28]</sup>。再比如,从天山南北的“诺鲁孜节”、西北民族的“花儿会”,再到湘黔桂山地的“四月八”、西南民族的“火把节”与“泼水节”,这些多民族共有节日是由于居住相近、历史同源、文化相似等原因而被多个民族共同继承或习得了相似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共享一套类似的节日传统和仪式表演,进而催生出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族际共有文化符号,也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包容互助、团结友好的历史关系。<sup>[29]</sup>

正确把握作为“枝叶”的各民族文化,也不能只看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族际文化,而是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主干—枝叶”为框架,在中华文化“主干”的统摄下辩证讨论各民族文化的内在关系与功能定位。因为各民族文化并非外化于中华文化存在,而是一体多元、主从统合的关系。换个角度说,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普遍性存在,既非如西方同化主义般是对各民族文化的简单否定,亦非如文化本质主义般是脱离各民族具体文化形态的抽象概念,而是内在地将作为“枝叶”的各民族文化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内在环节。例如,满族旗装经民国上海裁缝融合苏绣、海派剪裁和西方立体剪裁等,演变为中华女性的传统服饰<sup>[30]</sup>,诸如此类的还有胡琴、琵琶、

马甲、坎肩、火锅、奶茶等,皆是各民族文化元素结构性吸纳为中华文化系统的有机组分。因此,要正确把握作为“枝叶”的各民族文化,避免将“枝叶”异化为脱离中华文化主干的“他者”标本的同时,也要警惕以“多元”的各民族文化消解“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认知偏差,须在“主干与枝叶”的辩证逻辑中,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总体而言,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主干—枝叶”框架将中华文化视为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生命体;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并非单一族别文化的代称,也非族际文化交往的统称,而是在历史层累中积淀出的中华共享文化共识,其根系既深植于历史的中国,更发展于当代的中国;作为“枝叶”的各民族文化则象征各民族的独特性,既依托中华文化主干输送的文化养分维系生存,又将本民族文化特质转化为有机养料反哺主干。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厚植中华沃土,茁壮中华文化之干,才能根深干固;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守正创新,繁茂各民族文化之叶,如此通过“根系深扎中华沃土—主干挺拔中流—枝叶舒展生机”的结构方使得“多枝叶—主干”的中华文化之树永葆生命活力。

#### 四、“国家—民族”理论视角下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在对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讨论中,笔者曾提出当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工作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构建过程中,应实现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构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国多族”范式。<sup>[31]</sup>“国家—民族”理论认为,在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中,国家居于主导地位,是资源分配与权力配置的主体,通过自上而下的伞式结构支持民族地区的发展,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发展的根本保障。<sup>[32]</sup>这一范式在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及其关系的阐释中同样具有理论适配性,中华文化即是国家文明形态的“主干”,各民族文化则为依托主干生长的“枝叶”。

作为一种“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State),中国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sup>[33]</sup>,这种“文明—国家”的互构性揭示出中华文明基因通过大一统政治伦理、礼俗共治的社会网络、多民族交融治理方式,持续形塑着国家制度框架与民族关系调适机制,而国家政权对中华文化结构的制度化保障又反向强化了文明传承的稳定性。因而,关于中华文化与各

民族文化及其关系的新时代研究,亟须以“国家—民族”视角,立足“国家”阐明中华文化何以在多元互动中始终保持主干地位,而各民族文化又如何在这一框架下实现“各美其美”的共生共建、共享共荣。

(一)从“国家—民族”理论看,中华文化的本质是“国家文化”

“中华”概念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国家代称三位一体的。其一,自从“夷夏之辨”到“夷夏之变”的传统华夷观始,“中华”便非固定族裔范畴,而是依托文化实践与政治归属而构建起的超越血缘的“文化—政治”弹性认同框架,各民族的族别身份始终处于“自在”到“自觉”的演进中,最终统合于“中华民族”。其二,作为文明象征的“中华”,以汉字书写系统、礼乐制度及天下观构成跨地域的意义解释网络,将早期分散的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统一为“中华文化”,承载着超政治实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三,作为国家代称的“中华”,映射着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互构逻辑。传统“大一统”意识形态以“天下一家”的法理叙事和“华夷一体”的历史谱系建构,赋予古代王朝以“国家”的代称的文化合法性与华夏正统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称,简称“中国”,既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又维系着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认同。这种三位一体的概念特质,使得中华文化超越了传统文化范畴的边界,与民族身份、国家结构三者之间构筑起互为表里的对等关系,中华文化的本质就中华民族的国家文化,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超越各民族的文化。

中华文化是中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持数千年不间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sup>[34]</sup>。从贯穿两千余年中国历史中更为宏大的大一统国家理念来讲,中华文化往往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体现着一个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sup>[35]</sup>因而为个体所共享的中华文化,也是国家进行国民文化整合的国家文化,包涵着由各个民族、地区与区域所共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纵观历史,从周代“制礼作乐”构建跨区域的礼制共同体,到秦汉“书同文、车同轨”铸造超地域的符号系统,国家始终通过制度建构将多元文化熔铸为有机整体。也就是说,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就诞育出共通共享的民族共有文化,并超越56个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权、制度等关联在一起系统构建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在此意义上,中华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本质就



在于其通过政治整合与文化熔铸而成的超单一型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属性。在统一的国家意识和整体性的中华文化之下,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成分逐步增多,并不断被聚合在系统性的中华文化之中,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就越来越强,最终铸成“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直至今日,中华文化作为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核心载体,始终以“国家主流文化”的形态贯穿历史进程,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现代国家的精神内核,以自身为“主干”不断深化各民族对中华共同文化根基的认同。

简而言之,中华文化的演进史本质上是“国家”引领下的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发展史。反过来,中华文化又成为古代国家“大统一”“大分裂”时的精神核心,既是分裂时期维系统一向往的文化基因,也是统一时代巩固政治一统的精神纽带,两者构成互为因果的历史对等关系。由此观之,中华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本质,正源于其在“分”“合”历史周期中始终保持动态平衡,既能以统一的中华文化消解分裂时期的地缘离心倾向,又能以一统的政治格局巩固统一时代的文化向心趋势,进而造就得出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相互塑造、双向强化的超稳定结构。而这种“中华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共生对等关系,使其既区别于西方“民族—国家”模式下文化认同与族裔身份的刚性绑定,也超越了单纯“文明国家”的静态文化描述,构成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根本特质。

(二)从“国家—民族”理论看,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主从统合”关系

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关键要把握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从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来看,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既是多元共生关系,即各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枝叶”,通过地理单元连通和政治文化内嵌萌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网络;也是主从统合关系,中华文化作为“主干”,通过国家主导的大一统格局和儒家思想统摄各民族文化,而各民族文化则通过创造性转化反哺主干,达成“根深干壮,枝繁叶茂”的文化生态。而在这两重关系中,主从统合具有更根本的导向性意义。中华文化始终在古今文化传承、地域文化交融、多民族共创共享、内外文明互鉴中以“主干”作用引领着各民

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滋养中交融凝聚、一体多元发展。

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主从统合”关系的确立与发展,在于其较早地构建起超民族、超地域的政治文明共同体框架,较早使“国家”与“天下观念”成为超越族群的最高认同实体。梁启超曾言,“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sup>[36]</sup>。由此可见,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已然成为国家共同体的精神脊柱与具象化表达,其核心功能在于塑造出超越族别差异与族际交流的国家文化,而儒家思想占据着核心地位。梁漱溟则据“儒家文化很早就成为中华文明底层”提出“中华文化早熟论”<sup>[37]</sup>,这种早熟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文化惰性,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为早期时国家对多元区域与民族文化的统摄力并传承至今,造就了“百代皆行秦政法”的制度与文化连续性,进而通过国家权力的制度化运作熔铸为具有高度凝聚力与主干引领性的文明共同体。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以国家力量为支撑、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一条中华文化主脉,其主干地位既源于地理区位的天然优势,更依托于持续吸纳各民族文化支脉以保持发展活力。从考古学视角观之,中国史前文明呈现“满天星斗”式<sup>[38]</sup>的四方辐辏态势,当时各文化群落间虽存在初步互动网络,但未产生制度化统属结构。究其根源,前国家时代虽存在着一些文化交流,但受限于部落联盟的政治松散性,制度化的文化整合机制仍未完全确立,只是“文化多元性”的原始积累期;而现代意义上“各民族”的概念尚未产生,只有若干族群、部落等的存在。不过此时已经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发下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sup>[39]</sup>,或称“文化互动圈”<sup>[40]</sup>。而这种区域文化互动及地理单元间的差异性已为中华文化埋下伏笔:中原地区位居黄河中游的“天下之中”,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流纵横、四通八达的地势便于文化传播,“枢纽性”地理特质为其日后成为中华文化主干提供了基础。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距今5300年到4000年间,各地区文明化进程都有很大发展,逐步促成了兼具稳定性与向心力的区域性国家政体,相继迈入早期文明阶段。<sup>[41]</sup>大约在龙山文化末期,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性文明相继陷入发展停滞或社会崩溃的困境,与此相对,中原文明却依托多元文化要素的系统熔铸,渐进孕育出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sup>[42]</sup>可以说,早在中

华文化的起源时期,华夏先民就因应对外在压力而超越一邦一族之界限催生出超大规模共同体,相应地也通过多地域、多层次的文明互动经夏商周青铜文明奠定起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并在文化一体化发展中催生出政治一统<sup>[43]</sup>。这种“源流一体”的演进逻辑在秦汉后更趋成熟,在“主干合一”(中华文化主干统摄各地方、各民族文化支系)与“多元一脉”(各地方、各民族文化汇入中华文化一脉)的双向建构下,各民族文化如同枝叶,既从大一统制度中汲取政治整合力、经济互通性等养分;又以独特性反哺中华文化主干的文化解释力,进而铸就“主干分明而枝叶扶疏”的中华文明格局,各民族皆能在这一共享价值框架中找到生存发展之道,自愿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因此,多元的各民族文化融聚成一体的中华文化。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这种主从统合逻辑使得中华文化在五千年的文明赓续中既有主线方向,又有要素动力,二者的辩证统合铸就出兼具强大主体性与开放包容性的国家文化形态。

## 五、结 语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辩证把握不仅关乎文化治理的实践效能,更触及多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的本体认知。基于“国家—民族”理论框架,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始终以政治一统、经济互通、社会互嵌与文化共享为根基,在历史长河中熔铸出超越单一民族的共同体属性;作为“枝叶”的各民族文化则依托主干的价值引领,在展现出各自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也在交融共生中凝练出各民族互嵌共生的文化交往网络。两者在“主从统合”逻辑下,既维系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连续性,又保证了各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性,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根深干壮、各民族文化枝繁叶茂”的中华文明生命体。当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中华文化更需以“主干”定力抵御文化霸权与分裂风险,以“枝叶”活力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守正创新中构建兼具文明底蕴与现代气象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sup>[44]</sup>面向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主干—枝叶”关系、“主从统合”

机制的认识。理论层面,要厘清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基础与各民族文化的权益边界,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同时,强化其与中华文化主干的有机层级联系。实践层面,在党和国家对文化资源配置的统筹下,通过分级管理、属地管理等制度化行政机制,确保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在中华文化统一框架内有序生长,使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同频共振。唯有如此,方能在文明存续的维度回答“何以中国”,在文明赓续的脉络中阐释“何以中华”,在文明创新的高度诠释“何以现代”,以中华文化的主干性缔造出各民族向心凝聚的国家文化引力场,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新篇章。

## 注释:

①“国家—民族”理论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强调,从中国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出发,重新认识新时代民族工作中的重大“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因而在探讨民族地区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中央与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则是通过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相关理论参见“国家—民族”系列文章:张继焦、尉建文、殷鹏等:《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张继焦、柴玲、陈楠等:《再论“国家—民族”理论》,《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张继焦、尉建文:《三论“国家—民族”关系——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张继焦、党垒:《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国多族”范式——四论“国家—民族”关系》,《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6期;张继焦、党垒:《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学刊》,2021年第1期;乔珊珊、党垒、张继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三个维度》,《民族学刊》,2021年第6期;谢圣庚、张继焦、张嘉熙:《“国家—民族”理论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民族学刊》,2023年第7期;张继焦、吴玥:《超越“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民族”理论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海民族研究》,2023年第4期;刘云广、张继焦:《中华文明根性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历史文化根基——基于“国家—民族”理论的理解》,《民族学刊》,2024年第1期;吴玥、张继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国家”与“民族”概念的演变逻辑与辨析》,《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1期;张继焦、曾庆环:《从“大一统”到“国家—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逻辑》,《民族学刊》,2024年第8期;张继焦、刘云广:《换一个角度看“何为中国”:从“大一统”观到“国家—民族”理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 参考文献:

[1][3][15]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2][5]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9-09-28(1).

[4][6][26]郝时远.各民族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中国民族,2020,(10):18-19.

[7]方堃,明珠.多民族文化共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5):9-15.

[8]孙悟湖,班班多杰.多元通和: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J].民族研究,2021,(1):89-104+141.

[9]洪美云,艾比·沙拉木,赵斌.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视域下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探析[J].民族论坛,2019,(2):3-11+24.

[10]马惠兰,王超辉.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和运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3):46-48.

[11]管守新.论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制度保障[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9(4):44-49.

[12]青觉,吴鹏.文化润疆:新时代新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话语与实践逻辑[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31(1):1-12+213.

[13]李翠.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精彩篇章[N].中国民族报,2021-01-26(5).

[14]张先革,李朝虹,潘志平.西辽对中华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作用[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2):63-69.

[16]刘柳.文化认同视域下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探析[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2):90-96.

[17]蒋海蛟,杨倩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研究基于中华文化认同的视角[J].实事求是,2024,(5):85-91.

[18]傅锁根,娄嘉琪.以中华文化主干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J].前沿,2024,(5):52-58.

[19]古春霞.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各民族文化的共情性[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1):51-59.

[20]马慧,王延中.准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J].新疆社会科学,2024,(2):123-131+150.

[21]王延中,宁亚芳.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关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5):99-109.

[22]王延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三大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8):57-64+168.

[23]黄大勇,李良品.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文化之关系探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5(1):22-28+117.

[24]周星.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式及创新[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1):105-123+174.

[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27]邢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论(第3版)[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46.

[28]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编委会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卷5)[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00.

[29]张继焦,吴玥.从族别标识到文化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多民族共有节日建设[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3,25(4):293-299+307.

[30]孙敬华,胡小伟.中华传统文化读本[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158-159.

[31]张继焦,尉建文,殷鹏,等.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J].广西民族研究,2015,(3):1-13.

[32]张继焦,党垒.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国多族”范式——四论“国家-民族”关系[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3(6):58-65.

[33]张维为.文明型国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

[34]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9-01(1).

[35]王延中,宁亚芳,章昌平,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析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9):1-9.

[36]梁启超.儒家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

[3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70-282.

[3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90-114.

[39]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J].文物,1992,(1):40-49+25.

[40]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A]//中国考古学论文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51-189.

[41]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N].人民日报,2022-07-04(9).

[42]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成果发布——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N].人民日报,2018-05-29(6).

[43]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59.

[44]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1).

[责任校对 李明娟]